

六四事件的幽靈^{*}

林培瑞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榮譽教授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跨學科講座教授

施奕如 譯

假使昨天是尋常無奇的一天，這天當中共有 1400 名非洲兒童死於瘧疾，而瘧疾是一種可預防亦可治療的疾病，但這些孩子就這麼平白無辜失去性命，我們將此視為稀鬆平常，然而一樁謀殺案件便足以佔據各大報頭條，原因何在？這個問題不僅棘手難解，還引出另一個疑問：何曉青與她書中訪談的人，為何對於一場 25 年前發生於北京的大屠殺事件感到如此憂慮？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至 6 月 4 日清晨，到底有多少民主鬥士命喪坦克與機關槍之下？確切數字仍無從得知，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會低於昨天在非洲因罹患瘧疾而喪生的人數。

天安門大屠殺的幽靈長久以來揮之不去。親眼目睹六四屠殺的人，乃至於受害者的朋友家屬，陰影至今仍縈繞其記憶；當時支持中共政府且至今立場保持不變的人，這場殺戮其實也一直懸在心頭。當年下令屠殺的鄧小平雖然已經作古，但是對中共內部知情和負責執行武力鎮壓的人來說，天安門事件始終是觸動他們敏感神經的話題。這些當權者很少留下有關天安門事件的文字記錄，確實，中共官方對該事件也是採取壓制政策，然而從這些人的作為，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對天安門事件始終記憶猶新。他們派出便衣公安監視曾公開評論該事件的人，雇用成千上萬名網路警察，移除所有網站與電子郵件中與天安門大屠殺相關的字眼與資訊。此外，每年一到「敏感」的 6 月 4 日，便出動數十名便衣與制服公安到天安門廣場（六四大屠殺緣於當年在此處發生的抗議遊行）周圍巡視，防止「滋事份子」搗亂，以免勾起人民的回憶。中共官方的說法是：

* 譯按：本文最早的版本改寫自何曉清（Rowena He）《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一書的引言，由Palgrave MacMillan於2014年4月出版。原文詳見以下連結：<http://www.chinafile.com/Specter-June-Fourth>。

「對反革命動亂，中國人民早有正確的歷史定論」，這種牽強之詞更突顯其做作。如果中共當局真的相信他們口中的「中國人民」贊成屠殺，那麼他們應該在每年6月4日開放天安門，讓民眾湧入廣場共同譴責當年那些反革命份子。然而實際上中共是反其道而行，足證他們知道真相不是那樣……

簡言之，一場25年前發生的屠殺事件之所以如此重要，確有其因。雖然死亡人數相對較少，但這個事件攸關一國人民的命運，是中國十億人的轉捩點。

從美國出版的《天安門文件》一書（*The Tiananmen Papers*）**可得知，中共高層將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視為生死交關的問題。當時抗議遊行不只出現在北京，幾乎每個省會都出現大規模抗議，讓國家副主席王震、總理李鵬以及其他高層認為中共政權面臨危亡的風險。

西方的親共人士在敘述天安門大屠殺時，有時會使用「悲劇」或「錯誤」之類的詞語，但這會造成誤解。中共當局當年使用暴力絕非偶然，是經過仔細盤算的結果，而且無論是從前或現在，中共都認為這是正確的選擇，其實當時使用催淚瓦斯、水柱或木棍也能驅離聚集在天安門的民眾（1976年4月5日的另一場天安門遊行中，面對抗議毛澤東高壓統治的群眾，中共政府便是使用木棍驅散，收效彰著，且過程中極少或無人遭打死）。

1989年中共之所以決定出動坦克、動用機關槍鎮壓百姓，原因在於採取令人恐懼的武力手段，能展現的威嚇力量不僅限於當前的鎮壓行動，更可發揮超越時空的影響力。暴力鎮壓可讓全國三十個省分的民主示威群眾因恐懼而打退堂鼓，且讓中國人民在往後數年內都謹記這個警告：「最好不要跨越中央政府的界線，否則有你好看！」，事後證明確實如此；而武力手段最重要的目的是維繫中國共產黨的政權，這個目的也確實達到。

中共決定動用軍隊鎮壓自己的百姓，嚴重破壞了共產黨的形象。在1950年代初期，大多數的人民對中共喊出「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仍懷有理想，這種期盼替中共政權提供政治學上所謂的「正當性」。即使在毛澤東執政晚期出現

** 編按：《The Tiananmen Papers》一書由Zhang Liang、Andrew J. Nathan（黎安友）、Perry Link（林培瑞，即本文作者）以及Orville Schell編輯，PublicAffairs公司於2001年1月出版。中文譯本於同年5月由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中國「六四」真相》。

十年浩劫暴亂，重創其執政正當性，但 1976 年毛澤東死後到 1980 年代間，許多中國人仍期望中共能領導他們走向美好的未來（他們也別無選擇，還能怎麼想？）。直至 1989 年，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仍舊建立於人民對政府的期盼之上，然而「六四」的殘暴鎮壓讓希望就此幻滅。何曉清書中的訪談對象易丹軒說：「槍聲實際上揭穿了政府長期的偽裝和謊言。」他發現中共最在乎的始終是權力。

天安門大屠殺因此留給鄧小平與共黨高層一道難題，既然已失去社會主義理想的後盾，他們的「正當性」該從何而來？六四後幾週，鄧小平公開表示中國人民需要「教育」，於是大學生被迫在「坦白」大會上承認自己思想偏差，並譴責天安門反革命的暴徒。這種做法既膚淺，也毫無意義，但是鄧小平長期激勵民族主義與「教育」中國人的伎倆卻能收到效果。在教科書、博物館乃至所有官方媒體，都把「黨」與「國」連結在一起，所謂愛國，等同於愛黨又愛國，中國主辦 2008 年的奧運，也就成為「黨的一大勝利」。從此以後，外國對北京的批評不只是「反共」行為，而是「反中國」行為。中共將過去與現在跟日本、美國的衝突，以及現在台灣、西藏的「分裂主義份子」都加以誇大渲染，以便在「敵國」與「黨國」之間劃清界限。同時，還不斷提醒人民勿忘 1937 年的南京大屠殺，當年有上萬名中國人遭到日本士兵屠殺（毛澤東執政時，出於個人政治權力的相關因素，刻意壓制人民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藉以引發人民的仇日情緒，並強化人民對國家政權的支持，雖然這種策略的拿捏需極其精準，因為如此強烈的情緒容易失控。

中共政權的這些「教育」方式，利用民族主義與經濟發展重新界定了它的合法性（雖然嘴裡仍說著社會主義理想的語言，但這僅是外皮而已），然而這種新的自我呈現方式也讓中共更難擺脫天安門大屠殺的陰影。中共當局的一切努力似乎都遭受到六四事件的破壞。1989 年發生天安門大屠殺，對中共建立在社會主義理想上的正當性予以致命的一擊；而現在，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重新建立在黨民一家的概念上。然而，當年中國共產黨對著自己人民開槍的記憶，則成了最明確有力的反證，說明黨民並非一家。

大家並未忘記在機關槍下黨與人民的對立，因此中共政權需要抹除這些公

眾記憶。於是中共採去既「推」也「拉」的策略。所謂「推」，就是警告威脅，對於不聽話的人，沒收電腦、手機、不准辦護照、強迫失業、扣押銀行帳戶；更冥頑不靈的，便加以軟禁與逮捕。所謂「拉」，則是邀請你去「喝茶」，好言相勸說，若想過好日子，最好別談天安門大屠殺之事，而且現在禁口還不算晚，告訴你其他決定閉嘴合作的人日子過得有多好。另外還會向你施惠，提供美食、旅遊、就業與其他好處（若能舉報他人，獎勵更多），最後還提醒你最好別洩漏這段邀請你喝茶的談話。

在中國近年來充斥物質主義與拜金思想的社會裡，「拉」的策略顯得格外有效，物質財富成了中國人最重要的公共價值，人民的所作所為大抵都是為了追求、獲取與彰顯財富。對許多人來說，物質層次的生活水平確實大幅提升。西方分析家曾指出，這種現象深深鞏固 1989 年後的中共政權，此言不假；但當中共官方說自己「成功讓上億人脫貧」，而這些分析家也重複這個論述時，卻是大錯特錯。事實上，1989 年以來的情況恰好相反：是中國人民讓自己成功脫貧，因為他們辛勤工作，忍受工時長、工資低的條件，以換取溫飽，而在這個過程中，菁英階級獲取的財富比例更高，其中有些人甚至富可敵國。

大抵而言，中國經濟起飛的過程如下：毛澤東執政期間，除了日常所需，中國人的生活毫無自由可言。1976 年毛澤東過世後，尤其在 1989 年大屠殺之後，鄧小平改採溫和手段，但除了放寬「賺錢」之路外，政治、宗教乃至任何「思想」問題仍繼續箝制，結果人民便開始全力追求財富，畢竟這是唯一的選擇，他們不被允許將精力耗費在其他事上。人民辛勤工作，工時長、工資低、無工會保障、無賠償法規保護、無言論自由、無獨立司法，上千萬的勞工終年辛勞，在城市裡工作得不到平等的法律地位。這種情況下他們能創造龐大財富，又何足稱奇？過程中的細節當然更為複雜，但是這絕對稱不上是經濟神話或「奇蹟」。

1985 年鄧小平採取「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策略，也確實有效。不意外的是，先富起來的都是政治關係良好的人，關係好資源就多，就更容易貪污。自 1990 年代中期起，菁英份子的財富開始暴漲，中國財富不均的程度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僅略遜於非州與南美洲的低度開發國家。大街小巷與網路

上廣為流傳的笑話、小曲、順口溜普遍反映出老百姓強烈的仇富心態，以及對菁英致富方式的厭惡。但這些觀點在官方媒體上一直都看不到，就如同其他關於公民價值的自由討論一樣，一旦觸及平等、民主、憲政、未經當局認可的宗教等議題，相關討論便會受政府監視，遭到封口。

社會上崇尚財富蔚然成風，加上政府當局又限制人民公開討論其他社會議題，導致社會的公共價值越趨貧乏。捷克政治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談到「後極權主義」，指出無處不在的官方謊言構成了人民的另一種日常生活。六四民運人士沈彤在何曉清著作中提到：「在一個警察國家中生活，實際上就是活在一個巨大的公共謊言當中。」中國民運領袖王丹在解釋人們隨著時間推移而習慣於謊言的行為時，發現這些人會「下意識的說謊」。中國讚揚鼓勵人民追求財富，這一點與捷克有所不同，但情況並非較為良好，某種程度來說，中國的拜金熱非但沒有減低謊言虛偽的程度，反而使之更為深化。

中國的新富階級似乎正在摸索要如何展現「新富階級」該有的樣子。毛澤東執政時期有篇諷刺漫畫，讓人一窺資產階級揮霍無度的模樣：穿新鞋、戴名錶、開好車，享用美食美酒，恣意放縱情欲，都是人性邪惡的象徵。毛澤東時期後，進入「財富等同榮耀」的年代，描繪資產階級的漫畫仍俯拾即是，但社會對財富的態度轉為肯定認同，中國富豪前進巴黎、峇里島大肆購買香奈兒香水或 LV 名牌包等奢侈品，消費力傲視全球，他們買名牌包的目的並不是要裝東西，而是展現自己有能力購買真品名牌包（而非充斥中國的仿冒品），且是直接從法國買回來的奢侈品。中國人出國旅遊，可能會多買幾個名牌包帶回國轉賣，賺取價差利潤——真是補貼旅費的聰明方法。轉賣包包、到巴黎旅遊、名牌包本身皆是時髦的標誌，但這些外表時髦的人內心是否踏實？或只是忙著炫耀比較、東奔西跑，而在另一個心理層次發現自己似乎過得很空虛（害怕停下來四處張望）？

以「唯物主義」來形容這種菁英次文化，恐怕不完全正確，因為不一定需要實際物質。「外在主義」可能較為貼切，購買名牌包並非為了名牌包本身，最終目的在於展示，如果成功達到炫富展示的目的，名牌包也不過是各種展示行為的載體，外表才是最重要的。但隨著這種次文化越來越普及，對這種現象

的挖苦嘲諷也隨之而來，這才是中國的希望所在。近年來街頭巷尾與網路上流傳許多諷刺笑話，嘲諷中國的各式假貨：假牛奶、假酒、假古董、假照片、假歷史、奧運會上假唱歌等等，甚至在動物園還出現了假獅子（以大型犬冒充）。中國小說家余華曾打趣地說，唯一能肯定是，真的東西就是假的假貨。

幾乎所有的諷刺笑話都在私底下口耳相傳，如果公開流傳則不會具名。有極少數人敢冒險公然堅持反對的原則，中共當局稱之為「異議份子」。當異議份子的代價很高，保持低調是比較聰明的作法，也就是私下對政府大肆撻伐，而在公開場合不動聲色。大家會認為異議份子是怪人，甚至連異議份子的家人也不例外，認為他們沒有顧及自家人的利益，親朋好友、街坊鄰居也都與他們保持距離，原因並非（像中共當局所說的）反對他們的思想，而是怕惹上麻煩。王丹公開成為反政府人士後，到父親故鄉走訪，村民在村子各個入口看守，以防王丹走得太近——但假使他真的現身，村民會把他藏起來。

有些人民接受中共政府的謊言，有些人則只是假裝接受，兩者間差別的重要性日漸降低。無論是真心或假意，只要願意接受，都能維護個人利益，也能融入「正常」的社會。最終，中共政府打造出的新世代，就如同何曉清所說：「完全無法想像一個社會裡的年輕人會為了理想而犧牲自己。」

然而，在更深的心理層次，長期處於冷漠、不確定的氛圍下，中國人會缺乏安全感（其實舉世皆然），因此中國的富豪開始把財富移往國外，把孩子送出國唸書。根據多份 2013 年的調查與報告，舉家移民的人數出現激增，尤其是經濟富裕的家庭更為明顯，而經濟情況稍差的人如果有機會移民，顯然也會跟隨其他人的腳步移居國外。

中國人想移居國外的理由很多，如空氣品質較好、經濟與教育的資源與機會較多，也跟由來已久的家族傳統（特別是中國南方的農民家庭）有關；但除此之外，更源於人民內心深處對於社會與政府的偏好，然而因為某些明顯的因素，對此沒有人願意明說。留在中國，是否能保證一個美好幸福的未來？即使是有錢有勢的中國人也不免有所存疑。以遷徙宣告政治立場，可說是中國古老的傳統。中國政治哲學的經典著作《孟子》成書於西元前三百年左右，孟子認為，一國君主是否有道，評斷標準在於人口多寡，也就是在上位者能吸引多少

百姓前來居住，若君主無道，百姓便會遷徙至他處。如何曉清等許多希望中國未來發展能更好的人（對國家衷心熱愛，而非共產黨式的「愛國」情操），都期望中國能重拾孟子所說的那種磁吸力。

何曉清談到 1989 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鄧小平的政策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她指出：

這些年來，鄧小平的政策促使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同時也重振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但也帶來極為懸殊的貧富差距與嚴重的貪腐問題，人民的冷漠無感日益加深，對政府的信任逐漸瓦解，每年需支出鉅額的「維穩」經費，而中國國際地位提升的同時，近來也逐漸顯露好戰的特質。

何曉清這類言論，在網路上遭到中共政權支持者的大力撻伐，有些是受政府付費聘僱的人，有些不是，但都不約而同迴避何曉清言論的實質內容，採取幼稚而空洞的人身攻擊，以「反中」、「賣國求榮」、「專找外國人的妓女」等字詞指控何曉清。本文無意再掀波瀾，只是我看過幾十則類似的謾罵，深度與篇幅大致都僅止於此，這些辱罵真正顯露的是，他們對於何曉清的話無法提出答案。

現今中國道德淪喪的現象，不能完全怪罪於 1989 年的天安門大屠殺。中共當局虛偽的官方語言讓人民變得冷漠無感，而這種冷漠更根源於 1957 年中國的「反右運動」以及 1959 年至 1962 年間的大躍進。中國藝術家艾未未曾說中國人「內心出現一場精神大浩劫」、「步伐加快，而雙眼無神」，似乎「無處可去，無處可躲」，對此毛澤東比鄧小平要負更多責任。然而天安門大屠殺確實是關鍵的轉折，少了這個事件，鄧小平讓人民「只許掙錢，不許有意見」的政策成效不會如此卓著，而這種政策造就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此外，六四屠殺還埋下恐懼的種子，影響極為深遠，雖然鮮少有人提起，但百姓皆有如驚弓之鳥一般惶恐。這也是六四發生至今，中共政府能平息社會情緒的原因。

這一切終將如何？我們當然不知道。共產黨箝制人民的伎倆向來收效卓著，能讓活在前現代時期的威權主義重現於二十一世紀，不可不謂是一大成

就。但長期來說，即使中共的激烈打壓讓中國與全球付出龐大代價，但中共政權是否為最終的贏家，還是令人存疑。

2010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薩（Mario Vargas Llosa）於今年發表一篇文章，文中表示：

我們對中共、俄羅斯與古巴極權主義所造成的落後，很難不倍感哀傷。共產主義帶給這些社會的任何進步，都會被它所造成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的遲滯所抵銷，這些國家也因此難以善用自有資源，建立以民主、法治、自由為基礎的現代化社會。舊的共產主義模式顯然已經成了歷史灰燼，但這些國家要擺脫陰魂不散的共產思維，還得耗費許多時間，作出不少犧牲。¹

羅薩一席話，恰好點出中共所打造的「愛國主義」中充滿諷刺的矛盾。中共政府為了讓全世界中國人都對國家感到光榮驕傲，所以鼓吹這種「愛國主義」，人人都要對中共威權政府阿諛奉承，而共產黨就是中國的象徵。然而，這個政府的所作所為，恰好讓中國在國際間喪盡顏面。試想，假使中國具有開放、守法、民主的政府，中國人會感到多麼光榮？人民會多麼自在樂觀？

何曉清這本書，如同流經一座座高山的無數河川支流，每個看似獨立又彼此相連的訪談故事，讓我們串起許多攸關中國命運的巨大問號。書中講述四個人的故事，即何曉清自己與另外三位受訪人，他們都是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重要參與者。故事中充滿各種寫實細節，比如王丹提到自己小時候曾在班上組個「功夫英雄團」，還有何曉清細數自己的童年，說幼兒園的同學搶了她的藍色金魚毛毯，讓她既受凍又害怕，在在反映出真實的中國生活，其中有些事件跟政治息息相關。又比如天安門大屠殺發生後，沈彤的家人非常恐懼，於是便銷毀所有與抗議運動相關的證據，但他們將文件沖入馬桶，而非採取燒毀的方式，以免燃燒的煙霧引人疑竇。此外也有許多無關政治的細節，比如有段文字描述沈彤在紐約家中餵女兒吃奶，而妻子正在準備早餐。

1 Mario Vargas Llosa, 2014, "Anti-Authoritarianism in the Age of Internet," *New Republic*, <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6095/internet-dissidents-cuba-china-russia-profiled-new-book>.

何曉清所記述的訪談內容很少編修的痕跡。這並非要指責出版社疏忽怠惰，事實上本書品質極高。所謂少有編修痕跡，指的是內容充分展現訪談原貌。何曉清在書中解釋訪談如何進行，而訪談過程的空白以及出人意料的轉折，也都完整保留於書中。有時受訪者會請她離遠點，甚至叫她閉嘴。整體來說，何曉清能理解受訪者的感受，也並不堅持這些人一定得出頭作英雄。他們都是一般人，體現人性的複雜，有優點也有缺點，具備勇氣但也並非毫無所懼。為什麼這一點如此重要？因為這種真實的形象跟中共政權發行的宣導冊子中所描寫的英雄與惡棍形成強烈對比。何曉清在本書中，讓粉飾太平的官方說法與經過精心編輯的謊言，形成文學上的反轉效果。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鄧小平表示中國人民需要「教育」，中共政府竭力向人民灌輸愛國主義思想，鼓吹民族主義，經濟至上的思維，努力澆熄人們對政治的渴望，並將其精神集中在民族主義和金錢上。這個作法其實是向德國詩人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致敬。布萊希特的詩寫道：「人民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因此政府決定解散人民，任命『另一批』人民。」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推動改革計畫，繼任的領導人亦延續其政策，但是否能持續見效？三十年後，中國人仍會甘心當鄧小平理想中的順民嗎？無論答案是肯定或否定，都伴隨巨大風險，就如同非洲兒童死於瘧疾的風險一樣。